

自然辩证法座谈会选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理论组 编



1977

自然辩证法座谈会选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理论组 编

(内部读物)

1977

前　　言

为了贯彻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积极倡导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中国科学院理论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全国科协）理论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于1977年3月在北京联合召开了自然辩证法座谈会。

会上许多同志满怀激情地缅怀毛主席对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亲切教导，畅谈了自己在科学的研究和生产实践中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体会；同时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揭发批判“四人帮”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科技战线革命，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会后，全国科协又在北京连续举办了几次报告会，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京外的许多单位和个人也纷纷来信要求印发材料。为此，我们将这次座谈会和报告会的发言，整理编印成这本选辑，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希望通过它的出版，能进一步促进广大科技工作者、理科教师和工农兵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技术骨干，更好地学习、运用和宣传自然辩证法，更加深入地揭发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努力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迅猛发展。

在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某些认识上的不一致，也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对此，我们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分清是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多多作出贡献吧！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中国科学院理论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理论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在北京召开的自然辩证法座谈会发言选辑。内容包括：座谈会纪要和十一篇发言稿。主要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在自然科学理论和哲学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四人帮”插手科技界破坏我国科研工作的罪行，以及学习运用马列主义哲学思想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体会等。可供广大科技工作者、理科教师和工农兵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参考。

目 录

- 前言 (ii)
自然辩证法座谈会纪要 (1)

* * *

- “四人帮”对科技战线的捣乱和破坏 李宝恒 (7)
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罪行 罗劲柏 (17)
**批判“四人帮”在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散布的
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何祚庥 郭汉英 (24)
险恶的用心，卑劣的伎俩
——批判“四人帮”对爱因斯坦的所谓“批判” 范岱年 (47)
批判“四人帮”在宇宙学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
形而上学 殷登祥 (63)
“四人帮”反对科研走在生产前面，否定基础理论
研究，严重破坏我国的半导体科技事业 王守武 (80)
批判“四人帮”的“科学技术上层建筑论”
..... 何祚庥 赵红州 郭汉英 (87)
自然科学与上层建筑
——驳“四人帮”的“科学技术上层建筑论” 赵红州 (99)
“四人帮”插手自然科学史的险恶用心 宋正海 李家明 (110)
- * * *
-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攀登科学高峰 杨 乐 张广厚 (119)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胜利 邹承鲁 (129)

自然辩证法座谈会纪要

一

为了贯彻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干扰破坏的罪行，积极倡导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中国科学院理论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全国科协）理论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于3月28日至30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自然辩证法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北京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工厂、报刊、出版社等单位和上海等地出席高能物理讨论会的同志共四十二个单位的七十多名自然科学工作者、专业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工人理论队伍的成员。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周培源、于光远、秦力生、钱三强等参加了会议。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同志方毅、李昌和吴亮平在会上讲了话。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接见了高能物理和自然辩证法两个会议的代表，并做了重要指示，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对科学工作者的关心和爱护，给了全体代表很大的鼓舞。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很有必要，也很及时。会议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心情舒畅，对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搞好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自然科学工作，充满了信心。

二

到会同志满怀激情地缅怀毛主席对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亲切鼓励；同时，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揭发批判“四人帮”无耻背叛马克思主义，破坏科技战线革命，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极其重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号召自然科学工作者“要学会用辩证法”，并多次指示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许多工农兵群众和科学工作者，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文化大革命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科学工作者学习自然辩证法的自觉性更加高涨，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自然辩证法工作也像其他工作一样，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到会同志愤怒地揭发批判“四人帮”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利用他们把持的舆论阵地，尤其是上海的《自然辩证法杂志》，大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的罪行。他们肆无忌惮地用唯心论偷换唯物论，用形而上学、诡辩论冒充辩证法，任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四人帮”的罪恶阴谋及其所造成的恶果的严重性，绝对不能低估，必须进一步深揭狠批，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座谈会议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自然辩证法有一系列极为精辟的论述，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宝库。我们坚持不懈地认真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这对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自然科学工作，更快地把科研搞上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促进四个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四人帮”的亲信、《自然辩证法杂志》的主笔，竟猖狂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叫嚣“对恩格斯，我也可以贴他一百张大字报”，胡说“辩证法就是搞诡辩”。这只能证明他们是一伙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耻叛徒。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锐利武器。它包括自然科学，但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参加座谈会的青年数学工作者

杨乐、张广厚同志和钻研自然辩证法的工人同志，以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函数论研究和进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具体事例，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关于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问题，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有指示。但是“四人帮”却大肆鼓吹“代替论”。反动文痞姚文元胡说什么“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自然辩证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哪里有自然科学理论”？这和当年杜林的所谓处在自然科学“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如出一辙。“四人帮”的这种反动谬论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就是既取消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又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来冒充马克思主义。他们以李柯名义写了一系列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荒唐地把物理学上的相对论，同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混淆起来，大加批判，全盘否定；他们要“彻底打破”能量守恒定律；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把分子生物学同机械唯物论的“还原论”，把遗传工程学同苏修的反动谬说“复制天才”混为一谈，横加指责；把现代宇宙学硬说是“本质上只能适应宗教的需要”，肆意扼杀这些新兴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却竭力美化那些唯心主义的错误理论。他们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甚至不惜浪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搞“永动机”。“四人帮”就是以这种卑劣的手法，来扼杀自然科学研究，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科技事业。

在批判“代替论”的同时，到会同志指出不可忽视对“哲学对自然科学无用论”的批判。“无用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同样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批判了“四人帮”反对科研走在生产建设前面的种种谬论。在科学与生产的相互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然而，科学也能反作用于生产。“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完全否定科学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别有用心地把周恩来、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提出的科学研究应该走在生产建设前面的正确指示，诬蔑为“科学决定论”、“否定了生产对科学的决定作用”。他们浑舞这根大棒，破坏科研工作，使我国一些科技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了，生产中一些

关键性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科研大大落在生产建设的后面，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

许多同志还揭发说，“四人帮”手中无真理，以鸣鞭为业绩，拿着棍子打人，不许别人开口，猖狂反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他们在《自然辩证法杂志》的那个亲信公开叫喊：“我们就是一家之言，不搞百家争鸣”。这种专横武断、依势压人的学霸作风，严重地破坏了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

会议认为“百家争鸣”是促进科学进步的方针。大家在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过程中，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出现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都要按“百家争鸣”的方针，根据科学实验的实践检验，通过自由讨论，通过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摆事实、讲道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增强团结，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

三

座谈会对今后，特别是一九七七年自然辩证法的有关工作，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建议。

(1) 一九七七年是我国从大乱走向大治的一年，自然辩证法工作，首先要深入揭发“四人帮”的阴谋，把他们肆意歪曲自然辩证法，妄图从科技领域打开缺口篡党夺权的罪行，公之于众。同时，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摆事实、讲道理，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肃清“四人帮”流毒和影响。

为了打一场人民战争，座谈会初步提出了若干大批判题目和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时，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某些受“四人帮”影响写过错误文章或说过错话的同志，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

(2) 在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过程中,要加强领导干部、专业人员同群众的三结合;加强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团结合作。自然辩证法工作应该积极支持科学的研究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要为促进四个现代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3) 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建议全国科协、有关学会和科技部门,经常举办各种座谈会、报告会,交流研究成果以及学习、运用自然辩证法的经验,探讨自然科学工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批判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

还要有计划地开展自然辩证法的普及、辅导工作。

(4) 建议全国科协会同有关部门积极筹办一个学习、运用和宣传自然辩证法的刊物,以交流揭批“四人帮”的经验,促进和推动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及时反映国内外动态。

(5) 加强自然辩证法读物的编译出版工作。建议各有关出版部门按专业分工范围,有计划地出版有关的参考书,辅导材料和知识青年的自学丛书。

建议教育部组织力量,编写高等学校的自然辩证法教材。

希望有关主管部门出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新版本,增加我国自己编写的注解;迫切希望出版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论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语录。

(6) 为了总结经验,互通情况,交流研究成果,讨论进一步开展自然辩证法工作,并酝酿筹建自然辩证法学会,建议全国科协在今冬明春召开一次有哲学、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工农群众代表参加的全国自然辩证法会议。

“四人帮”对科技战线的捣乱和破坏

李 宝 恒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①

“四人帮”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反动派，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极右派在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对人民科技事业的捣乱和破坏，也没有违背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一

利用自然科学反党是“四人帮”的一大发明。早在 1966 年初，反动文痞姚文元就说过：“你们自然科学界不行，一潭死水，要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扔一颗炸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国民党特务张春桥、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等忙于篡夺上海人民一月革命的成果，忙于改朝换代，这个问题暂时搁下了。

1969 年 7 月 25 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就向姚文元请示：“可否批判爱因斯坦以震动一下科学界。”同年，国庆期间，姚文元把一个亲信召到北京，面授机宜说：“爱因斯坦的核心问题是相对主义。”又说：“爱因斯坦不能理解无限性，也不能理解有限性，最后必然导致不可知论。”“这些问题要作深入地研究，可组织几个人先搞起来。”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1375 页，人民出版社，1967 年。

这个亲信回上海后，立即组织了几个根本不懂相对论的人搞起来了，并且指定要一个连无穷大的符号“ ∞ ”也不懂、问人家为什么要把“8”字倒着写的人，来为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把关。当时，他们为批判爱因斯坦定了基调，说：“爱因斯坦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政治上是反动的，哲学上是荒谬的，科学上是错误的”。总之，要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他们炮制的这个“炸弹”，是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的典型产品。后来，由于他们的典型产品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评才没有敢公开发表。

之后，反动文痞姚文元传下话来说：“你们写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要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先要肯定他的历史功绩，然后痛骂一顿，最后把他打倒。”因此，他们后来写的文章，调子改变了，改为肯定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称得上是一名革命的闯将”了。

但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并没有、也不可能因为捣乱失败而改变他们的反党本性，而是改变策略，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1972年，姚文元捡起了“批判爱因斯坦”这个没能扔出去的“炸弹”，下令加紧搞资料。他们拿出“四人帮”的绝技，霸占他人的劳动成果，从反党的政治需要出发，顽固地坚持形而上学和主观唯心主义，对爱因斯坦的论文和著作，进行随心所欲的剪裁，拼凑成一份资料——《相对论》。经姚文元审定，再化整为零，分成四篇，先后在《复旦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抛了出来。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旗子掩盖下，究竟想干什么呢？喽啰们在得意忘形之余说漏了嘴，泄露了“四人帮”的反党机密，道破了他们之所以要扔出这一批“炸弹”，是因为周总理在接待外宾时说过：“犹太民族出了一些杰出的人才。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1971年11月周总理同意大利前副总理南尼的谈话）

一

“四人帮”利用自然科学反党的新高潮，是对周培源同志的文章组织反革命围剿，借以反对敬爱的周总理。

早在 1970 年，周总理就明确指出，科学院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1972 年，周总理又多次指出，科学的研究部门要认真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产业部门应以研究应用科学技术为主，但也要研究理论；大学要兼而有之，把理科办好。周总理还谆谆嘱咐，对这个问题，不要象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并尖锐地指出，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锋芒所及，使“四人帮”及其余党为之坐卧不宁。他们密谋借题发难，妄图在科技战线上打开缺口，刮阴风，烧阴火，把反党矛头直指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同年秋，周培源同志根据周总理指示的精神，写了《对综合性大学理科教学革命的一些看法》。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四人帮”及其余党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作了一番极其卑劣、丑恶的表演，活现出这一小撮资产阶级阴谋家奸诈狠毒的本性。

张春桥、姚文元为了阻挠《人民日报》发表周培源同志的文章，就假惺惺地要《人民日报》记者到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去“听听意见”，暗地里则密令一个亲信去上海组织反革命围剿。于是那个亲信就立刻赶到复旦大学召开理科教师预备会，“统一思想”。他在会上定调子说：“周培源的文章有严重错误，代表一股右的思潮。”会后，他要别人把他定的基调转告一些知名人士，要他们到《人民日报》记者召开的座谈会上按此基调发表意见，并把座谈会记录整理送给毛主席，欺骗毛主席。

同年 10 月 6 日，周培源同志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姚文元来上海对那个亲信交底说：“周培源的文章不发不好，因为他写信告状，有背景，不好办，所以放在《光明日报》上发，这样可以引

起不同意见的讨论。”姚文元在这次密谈中着重谈了自然辩证法问题，第一次抛出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代替论，胡说什么：“现在有一股风，强调基础理论。”“我们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指什么？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指自然辩证法。”并授意上海的余党办刊物。《自然辩证法杂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策划办起来的。

10月底，张春桥来上海对余党们说：“要警惕右倾思想抬头”，今后，“不管什么地方刮来的风，不管是东南西北风，都要顶住。”在谈到自然科学问题时，更咬牙切齿地攻击周总理说：“你可以用杨振宁压我，我也可以用马克思压你嘛！”主子一声令下，奴才立刻狂吠。一个黑干将公然叫嚣说：“周培源的文章是右倾复辟的信号，是党内又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和亲信们，利用已经篡夺到的权力，调动各种舆论工具，精心策划了这次反革命围剿。从1972年底开始，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重复姚文元的代替论。当时，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批判周培源同志的文章，就设圈套，找替身，大搞阴谋诡计，授意《文汇报》组织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教师宓子宏等同志，写一篇“接近周培源观点”的文章。这篇短文经张春桥同意后，在《文汇报》上发表，加了按语，号召大家展开讨论，接着就发表了一系列围剿文章，蛮横地给这篇短文戴上了“否定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等大帽子。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伙阴谋家攻击的目标，当然不仅是宓子宏等同志，也不仅是周培源同志，而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四人帮”及其余党后来公然扬言，“周培源算个啥！他后边有人。”“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

利用文艺反党，是“四人帮”及其余党们的惯用伎俩。他们在科技战线上兴风作浪、捣乱破坏时，也用上了这一手。那个亲信的反革命政治嗅觉是很灵敏的。他一眼就看中了复旦大学编的一出小戏——《抗寒的种子》，称赞这个戏“有寓意”。因为，戏里轻蔑地攻击一位老教授发表的一篇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教学的文章，是“智育第一”，叫嚣要“严防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要“相信抗寒的种子

能顶住寒流”，借以影射攻击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是刮“理论风”，号召青年们把自己培养成为“抗寒的种子”，“顶住”这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他下令《朝霞》发表剧本，《学习与批判》发表评论，并推荐给“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审查，正式批准在全市公演，要电台录音，电视录象，反复播送，甚至还搞了黄杨木雕，流毒很广，影响极坏。

三

“四人帮”反党，由来已久。早在 1969 年 5 月，狗头军师张春桥就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名，对他的三个亲信进行“路线交底”，在边读边议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人帮”与林彪反党集团原来就是一丘之貉。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四人帮”继承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衣钵，更加疯狂地反党。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既不批林，也不批孔，却利用所谓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刮起了批“宰相”的黑风，搞什么批“周公”，批“现代的大儒”；在科技领域里，则煽动群众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在文艺领域里，则利用《中国画》和贝多芬音乐等，批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回潮”；在经济领域里，则利用“风庆轮”事件，以及造船工业调查、对外贸易调查等，批所谓“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他们又叫嚷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这一切都是“四人帮”射向敬爱的周总理的一支支反党毒箭。

1976 年 1 月 8 日，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就在这亿万人民无比悲痛的日子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迫不及待地向党发动了一场新的猖狂进攻。他们分头召开黑会，印发黑材料，下令各单位油印机可以一天开动 24 小时，大量翻印散发，“供批判用”。不久，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就用特务手法暗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带头向《汇报提纲》开火。接着，《学习与批判》发表了《汇报提

纲出笼的前前后后》，第一次亮出了“两个‘提纲’，一条黑线”的反动论点。意犹不足，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毫不掩饰地弹出了他们的基调：“从本质上说，《汇报提纲》就是《二月提纲》”，“就象两颗并蒂的毒瓜，都是一条修正主义黑线的产物。”这两支反党毒箭，后来都选进了三本小册子之一《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印发几百万份。那个亲信因此十分得意地说：“批判‘三株大毒草’，上海都抢了头功。”

“四人帮”对《汇报提纲》气势汹汹地发动反革命围剿，是他们利用自然科学反党的又一次高潮。这一次始终把矛头集中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妄图“顺藤摸瓜”，揪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来。但是，这一小撮反革命黑帮太猖狂、太不自量了。

1976年10月6日，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把这一小撮牛鬼蛇神永远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散布的流毒，远未肃清，他们制造的精神枷锁，至今还没有彻底砸烂，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扰乱着人们的思想，有待彻底整顿。

四

从上海科技战线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以下一些问题，迫切需要从路线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全面地、准确地加以整顿。

1. 关于理论与实践、科学与生产的关系问题

“四人帮”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形而上学非常猖獗，姚文元既不懂科学，也不懂生产，却杜撰了一个僵化的公式，胡说科学理论是直接从生产实践中来的。《复旦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自然辩证法杂志》按照这个公式，炮制了一系列奇文，歪曲历史事实，硬说天文学、核物理学以及半导体理论和激光理论等，都是直接从